

# 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与中国应对\*

赵明昊

**[内容提要]** 周边安全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近年来,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因素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诸多挑战,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加快推进军事安全政策变革,传统安全挑战与供应链、科技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体、多重议题、多维安全规范相互作用的复合安全困境,进一步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难度。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对华遏制,同时也通过操弄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等议题对中国施压,以构建灵活多样、相互嵌套的安全阵营。美国等一些国家推动以联盟政治和集团对抗为底色的安全规范,损害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治理规则和机制,形成了“规范性矛盾”,进而对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形成了冲击。着眼于营造与维护和平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亚太地区的落地,担当好“安全观念塑造者”“安全机制赋能者”“安全危机管控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等重要角色,推动包容、合作、务实的安全规范,努力缓解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关键词]** 亚太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球安全倡议 中美关系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3.04.016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复合安全困境概念借鉴了美国学者约翰·赫兹等人有关安全困境的论说,即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对彼此意图的疑惧以及对自身安全的寻求,加剧了国家等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竞争,进而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感,增加陷入冲突的几率。<sup>①</sup>复合安全困境的意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安全困境不只是在两个行为体之间产生,还涉及三个及以上的行为体,它们普遍具有较为突出的不安全感,并采取了加强安全的行为;第二,安全困境不只是涉及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因素,经济安全、科

技安全等更为广泛的安全关切和安全行为对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影响,不同领域的安全议题之间的关联度日益增强;第三,不同行为体在安全规范层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ZD172)和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科技发展变局及对华科技竞争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周桂银《“安全困境”:一项概念史研究》,载于《南大亚太评论》2021年第1辑。

面的分歧构成了安全困境的驱动力,各方能否在安全议程、安全机制、安全秩序等问题上达成妥协与共识,是安全困境能否缓解的关键因素。

复合安全困境概念为阐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近年来,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因素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诸多挑战,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加快推进军事安全政策变革,传统安全挑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体、多重议题、多维安全观念相互作用的复合安全困境,进一步增大了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难度。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观造成重要影响,美国实施“捆绑中俄”的策略,力图强化相关国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构建针对中国的新盟伴体系,加大对华“一体化威慑”,大有以阵营对抗路径塑造亚太安全治理之势。<sup>①</sup> 维护周边安全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关注点,本文旨在分析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以期更深入地把握动荡变革期的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形势下中国在亚太安全治理方面的角色选择和应对策略。

## 一、多元主体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享受了重要的“和平红利”,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然而,近年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升温,南海、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更趋复杂,一些亚太地区国家无端炒作“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威胁”,甚至明确宣扬“备战打仗”,持续增加军费支出,推进各领域军力建设。<sup>②</sup> 特别是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亚太地区国家出现某种“应激反应”。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试图借助乌克兰危机渲染紧张气氛,推进自身军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进而使亚太地区笼罩上军备竞赛阴霾。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22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军费支出约为575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45%,这一数额超过欧洲同年345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其占世界军费支出(22400亿美元)的比例为26%。<sup>③</sup>

第一,日本寻求突破和平主义路线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实施“海外安全援助计划”等扩

展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近年来,日本以应对钓鱼岛和台湾地区安全危机等为借口,不断增加军费支出。2021财年,日本军费增加7.3%,达到541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是1960年以来该比例首次超过1%,也是1972年以来最高年度增幅。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岸田政府宣扬“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调,试图借助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实现军事政策的全方位变革。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整備计划》“安保三文件”,标志着日本长期秉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将军费增至约720亿美元,将军费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左右升至2%。<sup>④</sup> 近年来,日本不断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从美国大量采购F-35战机、“战斧”巡航导弹、电子战通信系统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持续加强在其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通过在潜艇加装远程巡航导弹等方式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研发能击落高超音速导弹的电磁炮等前沿武器。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躁动日益增强,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客宣扬乌克兰危机是痛苦的教训,日本和美国须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地区的决心,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sup>⑤</sup>。

此外,日本持续升级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正式增设“海外安全援

① 赵明昊《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析》,载于《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3期。

② Kai He and Mingjiang Li,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o - Pacific: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gional Actors, and Beyon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1 - 7.

③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Reaches New Record High as European Spending Surges”, <https://www.sipri.org/news/2023/world-military-expenditure-reaches-new-record-high-european-spending-surges-0>.

④ Gregg Rubinstein, “Japan’s New Defense Buildup Plan and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new-defense-buildup-plan-and-its-defense-industrial-base>.

⑤ Ken Moriyasu, “U. S. Should Abandon Ambiguity on Taiwan Defense: Japan’s Abe”,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U.S.-should-abandon-ambiguity-on-Taiwan-defense-Japan-s-Abe>.

助”计划 欲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从美国的“副警长”变为“共同警长”，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企图值得密切关注。2022年1月，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访问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交换防务装备，以加强协同作战能力。日本与印度建立“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多项军事合作协定，包括两国武装部队可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2022年4月，日本与菲律宾举行首次外长和防长“2+2”会晤，两国围绕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展开磋商。日本还谋求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约深化军事安全关系，如日本与英国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等。2022年6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岸田和平愿景”，强调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将与“志同道合国家”深化安保合作，“如同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将两者同步推动”。岸田文雄提出，日本将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利用卫星、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加强海洋安保；未来三年日本将与20多个国家深化海上执法合作，培训800名以上海上安保领域人才；未来三年向印太地区国家提供价值20亿美元的海上安保设备以及海上运输基础设施援助。<sup>①</sup> 过去几十年，日本主要通过“海外发展援助计划”扩展国际影响力，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2023年4月，岸田政府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计划”，这标志着日本地区安全角色的重大转变。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斐济等将成为这一计划的首批受援国，获得来自日本的雷达、卫星通讯系统等设备，以加强其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sup>②</sup>

第二，韩国持续扩大军费支出，与美国加快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欲在朝鲜半岛之外的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sup>③</sup> 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军费支出的年均增幅高达7.4%（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年均增幅为4%—6%），并首次突破50万亿韩元（约400亿美元）。<sup>④</sup>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2022年韩国军费支出约为464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7%，排名位列全球第九。相较于文在寅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尹锡悦政府则展现出明显的“亲美倚美”姿态。<sup>⑤</sup> 2022年5月，韩、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美国决定终止《美韩导弹

指南》取消对韩国研发的导弹射程和载荷的限制，允许韩国开发中远程导弹。韩国成功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火箭等试验，制定远程炮拦截系统等研发计划。尹锡悦政府还宣称，将在韩国增加部署“萨德”系统，扩建导弹基地。韩、美两国成立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委员会，在网络战、电子战、信息战等方面加强协作。韩国空军成立空天作战研究组，与美国太空部队共享相关作战情报。韩国还不断深化与美国其他盟友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这表现在韩日关系升温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协作持续增强上。<sup>⑥</sup> 此外，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被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大额武器采购协议，围绕防务工业展开深度合作。<sup>⑦</sup>

尹锡悦政府大力炒作朝鲜的“核导威胁”，借助实战性色彩更强的军事演习展现强硬应对的姿态。2023年3月，韩、美展开五年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战略轰炸机等先进武器，涉及联合登陆作战、打击朝鲜关键基础设施等科目。值得警惕的是，韩国在核政策方面寻求新的突破。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设想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情形，将终结朝鲜政权作为美国核

- ① Keynote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at the IISS Shangri - La Dialogu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Japan”, [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_00002.html](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_00002.html).
- ② Gabriel Dominguez, “With Eye on China, Japan to Offer Military Aid to Like - minded Countri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04/05/national/japan-official-security-assistance-aid-china/>.
- ③ Kuyoun Chung, “Recalibrating South Korea’s Role and Regional Network in the Indo - Pacific: An Analysis from a Network - centered Approach”, in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5, No. 1, 2023, pp. 31 - 33.
- ④ Lami Kim, “A Hawkish Dove? President Moon Jae - in and South Korea’s Military Buildup”,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9/a-hawkish-dove-president-moon-jae-in-and-south-koreas-military-buildup/>.
- ⑤ Jagannath P. Panda, “Yoon’s Plan to Ditch Strategic Ambiguity will Test US - ROK Alliance”, <https://www.nknews.org/pro/yoons-plan-to-ditch-strategic-ambiguity-will-test-us-rok-alliance-dprk-policy/>.
- ⑥ 孙茹、王付东《美韩同盟涉华合作》，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8期。
- ⑦ Jada Fraser, “The Australian Factor in South Korea’s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australian-factor-in-south-koreas-security-strategy/>.

战略主要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韩国国内的“拥核论”上升。2023年1月,尹锡悦称“韩国有可能部署战术核武或自主拥核”,这是自1991年美国从韩国撤出战略核武器以来,韩国总统首次公开讨论以核武器武装本国。2023年4月,尹锡悦访美期间,韩、美发表包括加强“延伸威慑”等内容的“华盛顿宣言”,以提升美国对韩核保护伞的实效。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后,韩国也希望在核动力潜艇方面获得更大支持,同时助力正在加快研发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上述趋势将对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核不扩散努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第三,澳大利亚防务安全战略的“进攻性”趋于增强,对大国竞争演变为大国冲突的担忧加剧,着重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sup>①</sup>近年来,澳大利亚扩大了其对“直接利益区域”的界定。2020年7月,澳大利亚发布《防务战略更新》报告提出,从印度洋东北部穿过东南亚的海上和陆上区域,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是澳大利亚的“直接利益区域”,这包括了澳大利亚每年约60%的海上贸易涉及的南海地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消极变化,澳方跟随美国鼓噪南海“仲裁裁决”,支持美军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诬称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并借此推动其军事政策从“前沿防御”向“前沿部署”和“威慑型部署”转变,寻求所谓的“武装中立”。<sup>②</sup>近年来,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等在南海区域多次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在台湾问题上,一些澳大利亚政客也越发嚣张。2021年11月,时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声称,如果美国承诺派兵“保卫台湾”,澳大利亚作为其盟友不参加军事行动将是“不可想象的”。<sup>③</sup>2023年4月,澳大利亚公布《防务战略评估》报告,称“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的单极领导者”,不断深化的大国战略竞争是该地区的决定性特征,这种竞争转化为重大冲突的风险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该报告还明确提出,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澳大利亚以往设定的十年战争预警期已不复存在,需尽快提升备战水平。<sup>④</sup>

近年来,澳大利亚不断增加军力建设投入。2023年度其军费支出约为307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96%,这一比例在未来几年

将升至2%以上。<sup>⑤</sup>澳大利亚发布的《防务战略更新》《武装力量态势规划》《防务战略评估》等文件提出,需全面强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扩建澳境内的军事基地,提升与美国等盟友的互操作性。澳大利亚持续增加对美防务采购,如大量购置“战斧”巡航导弹、AGM-158B增程型联合空对地巡航导弹,用以装备“霍巴特”级驱逐舰、F/A-18“大黄蜂”战机等,大幅增强澳军远程打击能力。2021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将花费5.8亿美元升级其北部的四个军事基地,并在达尔文建设由美国出资、商业化运作的战略军事燃料储备设施。此外,澳大利亚与美国围绕防务供应链合作签署相关协议,计划投资10亿澳元建设本土导弹工业体系,在美国支持下生产和装备精确打击导弹。2021年9月,“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宣告建立,澳大利亚将在美、英支持下获得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三国还将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军事科技展开深入合作。这种新型军事联盟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长远影响不容低估,它为北约、“五眼联盟”等进一步介入亚太安全事务提供了重要接口。<sup>⑥</sup>

除上述国家外,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

① Sam Goldsmith, “Achieving ‘Deterrence by Denial’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Australia”, <https://www.aspirstrategist.org.au/achieving-deterrence-by-denial-will-be-a-major-challenge-for-australia/#:~:text=The%20aim%20of%20an%20Australian%20Defence%20Force%20conventional,should%20Australia%20become%20involved%20in%20a%20high-intensity%20war.>

② 师小芹《如何经营与“危险盟友”的关系?——澳美同盟机制探析》,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2期; Benjamin Schreer, “Why US-Sino Strategic Competition is Good for Australia”,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5, 2019, pp. 431-448.

③ Richard McGregor, “Australia’s Caution on Taiwan May Not Las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3/03/29/australias-caution-on-taiwan-may-not-last/>.

④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2023”, <https://www.defence.gov.au/about/reviews-inquiries/defence-strategic-review>.

⑤ Julian Kerr and Andrew MacDonald, “Australia Proposes Defence Spending Boost for 2023”,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australia-proposes-defence-spending-boost-for-2023>.

⑥ 陈晓晨、陈弘《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特点、影响与前景》,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太地区国家也增加了军费开支,并针对智能化作战等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加快推进自身的军力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等国家的挑动之下,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也有所增强。一些国家试图利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之前的“窗口期”,加大以法理“索权”、油气开发和渔业生产“扩权”、岛礁扩建与设施部署“固权”为特征的单边行动。<sup>①</sup>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不断加强军力建设,如菲律宾政府实施《国防改革计划》以及针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提升计划》等,从美国购置F-16战斗机、P-8A型“海神”巡逻机、“响尾蛇”空对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标准-3”型导弹等武器,推进落实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安全关系。<sup>②</sup>总之,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乌克兰危机冲击全球安全的背景下,较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对自身安全环境的感知趋于消极,且这类感知会相互增强,区域内多个安全热点问题呈现交织叠加的效应,特别是一些域内主要国家的军力建设将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强化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 二、多重议题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不仅与军事安全因素息息相关,还受到供应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美国对这一态势的塑造发挥了核心作用。<sup>③</sup>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大对华遏压力度,同时也通过操弄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等议题对中国施压。为了打造针对中国的所谓“实力地位”,拜登政府延续和升级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白宫在其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塑造为“地区恶霸”,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抹黑,将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歪曲为“扩张、侵略、胁迫”,力图制造和激化美国围绕地区安全秩序的竞争,宣扬要在亚太地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sup>④</sup>美国试图借此将其条约盟国与安全伙伴的力量深度融合,建立多层次、嵌套式的盟伴体系,以增强“集体实力”,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的趋势日益显著。

美国对亚太地区复合安全困境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实施“以台制华”策略,宣扬“大陆2027年前攻台”等不实论调,刻意渲染地区安全紧张态势,为其加强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加快构建盟伴体系提供助力。<sup>⑤</sup>美国将主要海空军力量以及先进的作战平台和武器部署到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不仅增加了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对地区内国家的军备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美国推动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双边联盟的强化,打造和充实美日韩、美日澳、美英澳、美日印澳等各类“小多边”机制,促动欧洲盟友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延伸,这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变得更加复杂严峻。<sup>⑥</sup>第三,美国在操弄“中国威胁”的基础上,试图拉拢更多亚太地区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安全阵营,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也对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既有的地区安全机制造成严重冲击,进一步限缩中国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多边舞台。

美国以阵营对抗为导向的做法,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美国的核心策略是将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安全化”,推动亚太地区的不同行为体深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为美国实施供应链重塑等政策提供必要的条件。应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对华“协同脱钩”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考量,其着眼点之一是应对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武

① 吴士存《南海海上安全挑战,中国需要感知什么》,载于《世界知识》2022年第1期。

② Fact Sheet, “U. 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philippines/>.

③ 凌胜利《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④ Jake Sullivan, “The 2021 Lowy Lecture”,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21-lowy-lecture-jake-sullivan>.

⑤ C. Todd Lopez, “Allies, Partners Central to U. S. Integrated Deterrence Effort”,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315827/allies-partners-central-to-us-integrated-deterrence-effort/>.

⑥ 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载于《当代世界》2023年第2期。

装冲突。<sup>①</sup> 因此,在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不断升温的背景之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之间的关联度日益上升,供应链、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治理难度增大。具体而言,美国的“阵营化”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供应链安全阵营。美、日、澳等国以提升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为借口,大搞供应链的泛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企图打造阵营化的“友链”,冲击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拜登政府以双边与多边结合的方式,通过“美国—日本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美国—新加坡增长和创新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供应链工作组”等机制,与盟国和伙伴构建供应链同盟。<sup>②</sup> 一些亚太地区国家也日益重视“经济安全”政策。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调采取提升日本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等安全措施,并保护日本的技术优势。日本与美国建立“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设立“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由负责经济和外交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主持,就半导体供应链稳定、出口管制等展开协调。<sup>③</sup> 此外,日美两国还共同推动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向印度等“可信赖国家”转移。韩国与美国在2022年5月签署“供应链与产业对话”谅解备忘录,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等,双方还在该对话机制下设立出口管制工作小组。澳大利亚与美国成立“战略商业对话”机制。拜登政府与印度恢复了此前中断的美印贸易政策论坛机制,并建立美印“半导体供应链和创新伙伴关系”。<sup>④</sup> 除了双边方式之外,美国与亚太盟友还通过多边方式加大协调,以应对供应链安全挑战。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设立半导体供应链工作组,并推动构建“负责任和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2022年2月,美日韩外长会议提出推进三边供应链和经济安全合作。2023年2月,美、日、韩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经济安全对话,强调要共同提升三国供应链韧性,增强供应链危机的处理能力,并协调应对“经济胁迫”。<sup>⑤</sup> 美国还为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提出的“供应链韧性倡议”提供支持。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将供应链作为该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与该框架的参与国在半导体、关键矿物、清洁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链安全预

警系统,提高关键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其二,科技安全阵营。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美中较量的重中之重,科技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显著增强,美国宣称要构建所谓的“民主科技联盟”。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政策协调中,如何确保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安全成为重要议题。此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框架下也设立了旨在维护科技安全的相关安排,力图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海底开发、太空等关键技术方面扩大对华战略优势。<sup>⑥</sup>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等新兴技术对军事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军队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离不开社会性力量的支撑,因此,科技因素对亚太地区复合安全困境的塑造力日益增大。美国及其盟友高度重视网络技术,加快推进网络空间军事力量建设。例如,美国与日本共同推进“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以网络安全为旗号,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加大对中国等国在数字技术、产品和企

<sup>①</sup> Victor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20, pp. 511 – 521; Timothy R. Heath, Kristen Gunness and Tristan Finazzo,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War: Scenarios of Syste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830-1.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830-1.html).

<sup>②</sup> Fact Sheet, “U. S. – 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

<sup>③</sup> Japan’s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 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7/20220730005/20220730005-4.pdf>.

<sup>④</sup>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cretary Raimondo Announces U. S. – India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and Innovation Partnership MOU in New Delhi”, <https://www.commerce.gov/news/blog/2023/03/secretary-raimondo-announces-us-india-semiconductor-supply-chain-and-innovation>.

<sup>⑤</sup> White House, “Readout of the Trilateral United State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Economic Security Dialogu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2/28/readout-of-the-trilateral-united-states-japan-republic-of-korea-economic-security-dialogue/>.

<sup>⑥</sup> Guy Boekenstein, “The QUAD’s Role in Tech Diplomacy”,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quads-role-in-tech-diplomacy/>.

业等方面的遏压,构建亚太盟友之间的网络安全合作体系。美国、日本、欧盟三方合作开展面向亚太地区国家的网络安全培训和演习。<sup>①</sup> 2022年5月,韩国宣布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北约还通过下设的“为了和平与安全的科学”项目,支持蒙古军队建立网络安全中心,并为其提供装备和训练。<sup>②</sup> 此外,人工智能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科技安全阵营的重点关注领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强调,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辅助改善决策,实现多领域集成,只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才能在快速变化的未来战场上获得信息优势和作战优势。<sup>③</sup> 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大了与其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如2022年4月美国和印度两国国防部宣布启动“防务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也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合作领域,包括促进相互投资、推进人工智能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尤其是重视加强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合作。<sup>④</sup> 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势必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深刻影响,军事决策进程的缩短、自主武器系统的部署等或会引发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误判,增大规避冲突或管控冲突升级的难度。

其三,海事安全阵营。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试图围绕海事安全问题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化阵营。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所谓“民主海洋国家”组成的联盟,在菲律宾海、孟加拉湾等区域多次组织海上联合演习,推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海事安全装备。另一方面,美国注重拉拢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2022年5月,拜登政府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提出美国将投入1.5亿美元用于扩大双边合作,其中6000万美元用于海事安全领域的相关项目。<sup>⑤</sup> 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我们正在把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防务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sup>⑥</sup> 此外,美国将越南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并试图推动美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注重帮助越南提升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DA2)能力,推动构建“海岸警卫队伙伴关系”,不仅为越南提供“汉密尔顿”级巡逻快艇、无人机等装备,还帮助训练越方人员,以

增强越南的海上军事对抗能力。此外,美国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大量先进的海空军装备,双方还举行了“超级哥鲁达盾”联合演习,澳大利亚、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均派军人参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在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巴淡岛共同建设联合战略海事中心,并扩建巴淡岛机场,以起降美军各主要机型战机。美国不断炒作中国在海上构成的“灰色区域”挑战,利用所谓非法捕鱼、海上执法等议题构建“小多边”机制,通过推动“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等具体项目加大对中国的安全遏制。美国宣称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监管的捕鱼行为已经取代了海盗行为,成为威胁全球海洋安全的头号威胁,还诬称“中国要为印太地区95%的‘非法捕鱼’活动负责”<sup>⑦</sup>。2022年5月,拜登政府在东京举办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上抛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欲借此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在海事安全方面的情报共享,在此基础上强化区域海事安全合作,并与“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大洋洲海上安全倡议”等机制形成紧密联动。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U, Japan and the US in Joint Cybersecurity Training”,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new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eu-japan-and-us-joint-cybersecurity-training>.

② NATO, “NATO Helps to Strengthen Mongolia’s Cyber Defence Capacity”,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0697.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0697.htm).

③ Terri Moon Cronk, “Hicks Announces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667212/hicks-announces-new-artificial-intelligence-initiative/>.

④ Husanjot Chahal, Ngor Luong, Sara Abdulla and Margarita Konaev, “Quad AI: Assessing AI-Relate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https://cset.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Quad-AI.pdf>.

⑤ The White House, “ASEAN – U. S. Special Summit 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3/asean-u-s-special-summit-2022-joint-vision-statement/>.

⑥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at the Shangri – La Dialogue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s Delivered)”,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059852/remarks-at-the-shangri-la-dialogue-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

⑦ The White Hous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此外,美国还与南海权益声索国增进海上执法合作,以应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美国海岸警卫队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分别签订双边协议,通过定期开展联演、实施能力提升计划、港口访问和基地使用等方式,在南海实现常态化的存在。<sup>①</sup>

### 三、多维安全规范与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

安全规范是指相关行为体处理安全问题、推进安全治理的观念、规则和机制,各方围绕不同安全规范的博弈是影响复合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国家推动以联盟政治和集团对抗为底色的安全规范,损害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治理规则和机制,形成了“规范性矛盾”,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制度制衡和竞争,进而对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形成冲击。<sup>②</sup> 维护亚太地区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在亚太地区多元主体加强军力建设、美国借助多重议题构建遏华阵营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注重从安全规范的层面加以应对,大力阻止一些国家将地缘冲突引入亚太地区,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治理。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在安全规范层面应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挑战的重要探索。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深刻剖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从人类前途命运出发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

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sup>③</sup>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形势下破解全球安全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国参与和引领亚太地区的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着眼于营造与维护和平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亚太地区的落地,担当好“安全观念塑造者”“安全机制赋能者”“安全危机管控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等重要角色,推动建立包容、合作、务实的安全规范,努力缓解亚太地区的复合安全困境。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穷兵黩武、阵营割裂、集团对抗,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筑牢理念基础

对于应对复合安全困境而言,安全观念或曰安全文化的塑造至关重要。<sup>④</sup> 早在1997年,中国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它被称为新安全观。2002年7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14年,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各方共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sup>⑤</sup> 全球安全倡议也吸收了亚洲安全观的主旨。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只顾一个国家的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的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既不可取也不可行。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

① 吴士存《南海海上安全挑战,中国需要感知什么》,载于《世界知识》2022年第1期。

② Kei Koga, “Institutional Dilemma: Quad and ASEAN in the Indo-Pacific”, in *Asian Perspective*, Vol. 47, No. 1, 2023, pp. 27-48; Xirui Li,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rious About ‘ASEAN Centrality’?”,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is-the-biden-administration-serious-about-asean-centrality/>.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51—452页。

④ [英]玛丽·卡尔多《全球安全文化》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6页。

⑤ 程国平《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方向》,载于《求是》2014年第14期。

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地区和全球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如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亚太地区处于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需坚持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守护和平稳定的底线。要坚定反对霸权式的安全思维和阵营对抗模式。虽然美国力图通过构建新的盟伴体系塑造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但是亚太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来源不尽相同,其与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关切存在差异。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并不希望陷入与中国的对抗性关系,不愿完全被绑到美国的“战车”之上。它们力图采取对冲策略,在中国和美国身上两边下注,既要安全保障,又要经济利益。<sup>①</sup>因此,中国需准确把握美国与其亚太盟国、伙伴在安全威胁认知、政策目标方面的分歧,合理利用它们在安全责任分担、防务费用分摊等方面存在的矛盾,<sup>②</sup>通过政府外交、政党外交、智库外交等多种方式,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在反对“新冷战”、抑制穷兵黩武方面形成新的共识,为动荡变化的地区安全形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sup>③</sup>

(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提升相关安全机制的影响力和效度,增强地区国家对“开放的区域主义”的认同感

从历史上看,东盟创建和主导了亚洲区域安全机制,实现了“合作性安全”的本土化,其中心作用得到广泛重视。<sup>④</sup>“东盟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功实践是地区国家团结协作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少有成功典范,具有集体协商、统筹规划、开放共享等鲜明特点。”<sup>⑤</sup>中国一贯支持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外交、通过磋商形式解决争端等为主要原则的东盟方式,注重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安全架构,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然而,美国重拾冷战旧思维,其安全战略以同盟关系为依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界,大搞封闭式集团政治,这不仅与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说辞背道而驰,也冲击了以东盟为中

心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sup>⑥</sup>中国需更加坚定地支持东盟,善于借助东盟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愿景对冲美国的构想,如用“包容的印太”制衡美国寻求的“排他的印太”。<sup>⑦</sup>需继续支持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机制,维护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中心性”。要推动“北京香山对话”、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中国设立的安全机制与东盟相关机制之间的对接。<sup>⑧</sup>与此同时,也需进一步深化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反恐、联演联训等,不断充实军事联络热线、海军舰船互访、武装部队人员交流等军事外交安排。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围绕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合作,如水、粮食、能源、公共卫生安全。可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实施相关项目,在中南半岛努力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此外,中国政府已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希望推动达成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

① [新加坡]马凯硕《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决策》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17—222页。

② Yukio Hatoyama, “US - China Rivalry and Japan’s Strategic Role”,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21, pp. 15 - 18; Victor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20, pp. 521 - 529; Nguyen Cong Tung, “Uneasy Embrace: Vietnam’s Responses to the U. S.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Strategy amid U. S. - China Rivalry”, i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5, 2022, pp. 894 - 900.

③ 有关“亚洲协调机制”的讨论,参见[澳]休·怀特《中国抉择: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198页。

④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7—216页。

⑤ 王亚军《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3期。

⑥ 参见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 - 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137 - 142.

⑦ 《东盟印太展望》文件明确提出,东盟将亚太和印度洋区域视为“一个密切整合和相互连通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东盟扮演中心性和战略性角色”,东盟希望看到“对话和合作而非对抗的印太地区”。参见“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 - Pacific”,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 - Outlook - on - the - Indo - 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 - Outlook - on - the - Indo - 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⑧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newyork.fmprc.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http://newyork.fmprc.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益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考虑到东盟及其成员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可以围绕网络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等议题,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对话协商,并为相关领域的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提供更具包容性、共识性的方案。

(三) 深入推动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战略沟通,妥善处理双边领土和权益争端,切实管控好地区安全热点问题

中国领导人多次作出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防开支合理适度。应看到,在美国试图加大对华战略遏压的背景下,东海、南海以及中印边境等方向存在的地区热点问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动态势。一些国家还妄图将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等安全挑战挂钩,以增强其对华外交筹码。中国需面向国际社会,清晰讲述中国周边领土和权益争端的历史经纬、是非曲直,有力应对美国等国家在道义上对中国的诬蔑与抹黑。应及时向一些试图打“台湾牌”的亚太地区国家传递明确信号,采取必要斗争措施,提高其追随美国遏华、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成本。与此同时,需用好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等机制,为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日划界争端作出努力。深化中日安全领域的对话,完善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可借鉴中美之间的做法,就制定中日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开展磋商。应坚持中印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重要共识,<sup>①</sup>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推动中印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在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线下磋商已恢复,各方一致同意将“准则”打造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升级版,确保“准则”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及南海共同治理提供更有力规则保障。为保证南海形势稳定可控,需以不冲突不对抗为底线,加强预防性外交和危机管控,减少“灰色地带”事态,倡导海上执法合作。中国需要在地区安全事务对话、推广中国安全理念、引导地区安全议程设置等方面更加灵活地用好智库专家、媒体人士等“社会性力量”。

(四) 在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方面主动作为,推动各方更加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倡导“发展型安全”,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可以主动就维护亚太地区供应链安全问题提出方案,全力破解美国在经贸上对华孤立、打压和“断链”的图谋,确保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稳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经贸格局中的地位。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关系,用切实可行的合作红利增进利益捆绑,为各方更好地处理安全挑战营造有利的经济条件。围绕科技安全问题,推动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对话,将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技术合作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要善用资本力量和本国的市场优势,适当降低技术产业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加大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技术合作。要倡导包容、开放、透明的亚太网络安全治理,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组织框架下的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等方面的对话,提倡和平解决网络空间争端和危机。重视应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网络和太空空间军事力量建设快速推进带来的挑战,与地区国家合作管控人工智能武器化、太空战场化等趋势,倡导适用亚太地区的太空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治理规则。在海事安全领域,可通过与东盟国家成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商签“南海非法捕鱼公约”、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等方式,构建南海区域海事安全治理合作体系。积极参与亚太区域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周边国家提供包括海洋科学考察、灾害预警、航海航空通信导航、搜寻救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打击海盗、反恐等公共产品。<sup>②</sup>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责任编辑: 段佩佩]

<sup>①</sup> 《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同印度媒体谈中印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zwbd\\_673032/gzhd\\_673042/202208/t20220815\\_10743075.shtml](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zwbd_673032/gzhd_673042/202208/t20220815_10743075.shtml)。

<sup>②</sup> 滕建群《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载于《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期。